

# 中顶庙会的历史叙事与都市村民的文化乡愁

孙庆忠 关瑶

【摘要】中顶庙是明清时期京师最为著名的碧霞元君庙之一。作为公共记忆的特殊空间，它承载了北京民间社会变迁的经验与脉动，也记录了乡民社会向都市街区转型的历史过程。自2006年以来，中顶庙会以“中顶庙民俗文化节”的名义举办了七届，其仪式过程沿袭了传统的规矩礼法，创造了一个历史与现实、心灵与身体相互融合的文化氛围。这种不断被激活的集体记忆，表面上看是在重温村落历史与追念过往生活，但其实质则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是都市村民以文化记忆应对现实处境的生存智慧。

【关键词】中顶庙 中顶庙会 香会 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13）04-108-06

明清之际，京师及华北各地对碧霞元君的崇拜之风尤盛。《帝京岁时纪胜》载：“京师香会之胜，惟碧霞元君为最。庙祀极多，而著名者七：一在西直门外高粱桥，曰天仙庙，俗传四月八日神降，倾城妇女往乞灵佑；一在左安门外弘仁桥；一在东直门外，曰东顶；一在长春闸西，曰西顶；一在永定门外，曰南顶；一在安定门外，曰北顶；一在右安门外草桥，曰中顶。”<sup>①</sup>至清中期后，一度“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的各顶先后衰落，均无法与被敕封为“金顶”的妙峰山相比。

碧霞元君是东岳女神，对她的信仰虽比泰山信仰后起，但在北方民众中的影响却比泰山信仰还大。尽管始终未被纳入国家正祀，但由于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其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因此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准正祀”。之所以能成为被官方肯定的民间信仰，除了它与正祀东岳信仰的密切关系外，还在于它在京畿地区的流行性和朝拜活动的无危险性。<sup>②</sup>那么，遍布于京师的碧霞

元君庙又缘何以“顶”冠名？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十三日建立的《中顶泰山行宫都人香贡碑》载：“祠庙也，而以顶名何哉？以其神也。顶何神？曰：岱岳三元君也。然则何兴于顶之义乎？曰：岱岳三元君本祠泰山顶上，今此栖，此神亦犹之乎泰山顶上云尔。”<sup>③</sup>也就是说，碧霞元君虽供奉于此，仍如在泰山顶上。

## 一、中顶庙及中顶庙会的历史形态

“泰山行宫□京师，其最著者中顶，所谓敕建弘仁普济宫是也。”<sup>④</sup>中顶庙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至1627年间），其最早记录见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帝京景物略》载：“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会桥下，伏流十里，道玉河以出，四十里达于潞。故李唐万福寺，寺废而桥存，泉不减而苻荷生。天启间，建碧霞元君

【作者简介】孙庆忠（1969-），男，辽宁沈阳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关瑶（1990-），女，辽宁沈阳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3）

①（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页。

②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8-365页。

③东岳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④康熙三十五年《中顶普济宫百子胜会碑记》，东岳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庙其北。”<sup>①</sup> 这里提及的万福寺，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带兵攻打高丽时，为祈求平安而修建的，中顶庙位于其旧址之北。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日下旧闻考》载：“草桥在右安门外。碧霞元君庙在桥北数十武，土人呼为中顶。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发帑重修，前殿奉碧霞元君，额曰资生溥化，中殿奉东岳，额曰大德曰生，俱皇上御书。”<sup>②</sup> 据《大清会典》记载，中顶属南苑奉宸院管辖，有香火地100亩。现在立于山门前的两尊神兽可能就是重修时制作。为方便香客朝顶进香，中顶庙建成后还在庙宇南边及北部的祖家庄一带各建了一座回香亭，香客走到回香亭时再烧香一次。<sup>③</sup>

中顶自建庙以来，立碑活动频繁。除了《中顶泰山行宫都人香贡碑》之外，尚有立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中顶普济宫百子胜会碑》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甲子老会碑》存于殿前。前者为“正阳门外猪市口百子老会众等诚立”，碑文记载康熙年间中顶庙于每年四月十八日举行百子会，会期戒坛设供，悬灯施食，以百数婴儿塑像供神。后者碑阳书有“京师顺天府大宛二县三关内外都察院众善诚建”。此外，还有数目众多的石碑被埋藏于正殿北面的地下，其中包括堪称名笔的康熙大学士王熙、李天馥撰碑各一，目前尚未挖掘整理。这些碑文承载了中顶庙不同时期的历史，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当时民众的生活形态。

中顶庙的闻名得益于中顶庙会。为庆祝碧霞元君的生日，每年四月十八日香客纷纷来此进香朝拜。据《宛平县志》记载：“四月一日至八日，遊戒坛、潭柘、香山、臥佛、碧云、玉泉、天宁寺诸名胜，为浴佛会也。十日至十八日，游高粱桥、西顶、草桥之中顶、弘仁桥、里二泗、丫髻山，为‘碧霞元君诞’也。”<sup>④</sup>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刊印的《宸垣识略》中引吴岩《游中

顶》诗后的注释有“岁以四月一日开庙”的记载。<sup>⑤</sup> 最早记录中顶于六月初一开庙的文献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朝市丛载》，其中有云：“中顶。历年开庙，六月初一日赛会，走街进香。”<sup>⑥</sup> 《燕京岁时记》载：“中顶碧霞元君庙在右安门外十里草桥地方，每岁六月初一日有庙会。市中花木甚繁，灿如列锦，南城士女多往观焉”，并提到《宸垣识略》中“吴岩诗注谓四月初一开庙，今改六月矣”<sup>⑦</sup>。

中顶庙地处京师南郊，水田极多，土壤肥沃，泉水丰富。因此，当地人以种花为业者甚多。“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sup>⑧</sup> “右安花畦”乃旧时京师一大盛景，每逢夏日荷花怒放，香闻数里。清人杨静亭《中顶》诗云：“盈眸苍翠望全迷，人影衣香踏绿蹊。一路树荫遮不断，荷风吹送草桥西。”得硕亭的《草珠一串》云：“右安门外少风尘，人影衣香早稻新。小有余芳开市后，坐看中顶进香人。”这些诗句描述了中顶地区的自然美景，也道出了中顶庙会因香会进香呈现出的盛况。晚清时期，因慈禧太后的垂青，民间走会达到了高潮。民国初年，中顶庙会仍极兴盛。据《群强报》1916年6月30日报道：旧历六月初一日，右安门外中顶普济宫开庙，城乡各处中幡、开路、大狮、秧歌、少林、石锁、花坛、跨鼓等会均往进香。昨经住持道士李永源稟请本管营汛，届期派兵弹压。<sup>⑨</sup> 由是可知走会者之多，观会者之众。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中，《旧京风俗志稿本》（1928年）对中顶庙会的描述，可谓生动传神。

“中顶在右安门外（俗名南西门）一里许，大道之旁，亦娘娘庙，殿宇在三十年前已剥落，今则成一瓦砾场矣。历年于六月初一开庙一日，游者甚众，惟游人目标，既非因神之灵迹而烧香，亦非因景之清幽而玩赏，盖仅瞻会而已。所谓会者，京俗又名曰高乡会，即南方社火之意也。太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②（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第五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1页。

③高世良：《南苑往事》，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8页。

④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⑤（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⑥（清）李虹若：《朝市丛载》，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⑦（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⑧（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⑨转引自北京市东城区园林局编《北京庙会史料通考》，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平无事，生计充裕，一班社会青年，八旗子弟，职务上之相当工作已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于是互相集聚，而为排会之游戏，如中幡会，狮子会，五虎棍，开路，少林棍，双石头杠子，挎鼓，什不闲，杠箱，均于是日进香。各会常因细故，而演成凶殴，按此等娱乐，虽无关生计，然若辈视之，直同生命，譬如今日之会，共为数十档，某档在某档之前，某档居某档之后，秩序均须大费斟酌，尤以同样之会为最费踌躇，倘或安排不当，即发生冲突，好勇斗狠，牺牲生命者，往往有之。会期多在暑天，天晴则更暑气蒸薰，汗流浹背，会中人常常晕倒。一班观众，拥挤鹄立于暴日之下，益以饮食冰水，及污滥食物，充杂肠腹，尤易生时症。如遇暴雨，则会众观众，又均立于露天广场之下，无可藏避，淋漓尽如水鸡，妇女尤所难堪，故当时所谓瞧会，均无何种好收场也。”<sup>①</sup>

文中所言之香会，遍布中顶庙周边地区，这里素有“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会”的说法。紧邻中顶庙的村落都有自己的香会组织，中顶村的大鼓会、西铁营村的开路会、释迦寺村的秧歌会，每逢开庙会期就会加入到进香的行列，祈求娘娘护佑平安。民国时期，虽有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起的陋俗改良活动的开展，但中顶庙的香火未减。1935年，南苑十八乡的乡绅曾募集五百大洋准备修庙，由于资金不足后期便中断了。当时，前门外有一间药房叫长春堂，长春堂的老板叫张子馥，信奉佛教，其子智障，久治不愈。当时，中顶村人刘德元为张家看家护院，他将中顶庙一些灵验的事情告知于张，希望神灵能治好少爷的病。1937年，张老板出资二百大洋，并组织其他人一起捐款，为中顶庙的重修做出了重要贡献。山门上的对联“万古琳宫称广济，重修宝迹继长春”流传至今，就是为了纪念长春堂老板捐款修庙之事。此次修复建起了山门、大殿和两间耳房，还重新请来了神像。大殿正中间供奉的是主神碧霞元君像，东侧供奉的是送子娘娘，西侧供奉的是眼光娘娘。“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北京，中顶庙的修复被迫终止，寺庙管理趋于松散。由于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庙里的住持道士李永源变卖庙产，寺庙破败逐日加剧。抗战结束后，中顶

村出现了一个负责组织中顶庙会的机构——康乐同缘委员会，由大鼓会会首张富春掌管。

## 二、香会的重整复苏与中顶的修缮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庙宇的祭祀与信仰功能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销声匿迹，早已偃旗息鼓的中顶庙会更是无人问津。1958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深入开展，中顶庙遭受严重破坏，娘娘像被埋到铁道旁的大沟里，大殿挪为他用。这期间，中顶村、西铁匠营村、释迦寺村合并成立了西铁营大队，下设6个生产小队。佛像被移出后，东配殿成为大队队部和公社的食堂，而后当过夜校，耳房里还养过牲畜。经历了文革之初的破四旧运动，中顶庙的神像不复存在，耳房被破坏，只剩下三间正殿。直至改革开放之后，这个空荡的建筑才被重新利用，作为西铁营大队第二小队的中顶村，还在庙里办了一个电木粉厂，后因效益不佳而停工。

1970年代末，沉寂多年的香会组织重获生机。尽管昔日祈求神灵护佑的各种仪式仍是禁区，冠之以封建迷信的污名依旧是民众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作为民间娱乐活动，更名为“花会”的香会却纷纷重现于城区与乡村。<sup>②</sup>中顶庙所在的丰台区是京城有名的“会窝子”，早在1978年，首批发掘整理的8档花会就进行了调演，至1980年代中期，已有43档花会恢复了活动。释迦寺村的秧歌会虽没能传承下来，但其末任把儿头的女儿陈德清，以自己的名字于1987年创立了“德清鲜花圣会”，并在京城的香会界享有很高的名望。此时，西铁营村的开路会尚未重整，老一辈玩角儿的飞叉技艺却被重新重视起来。起会于清末（约1904年左右）的“馨春开路会”，原名“新善开路会”，其第一代创始人之一是有“京城飞叉太保”美称的李永庆，他的弟子西铁营村的朱四爷、祖家庄的马福田、中顶村的李春林等十余人，在香会的传承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995年，在西铁营村委会和部分村民的支持下，李春林的次子李瑞民及其弟子钱志东、钱志杰对开路会进行了重整，会员达40多人。是年5月1日，会众还在

① 张江裁《北平岁时志》（上）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页。

② 参见孙庆忠主编《妙峰山：香会组织的传承与处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金顶妙峰山立了会碑。正是通过这种作为文化的组织，香会的表演技艺和走会的传统得以传承弘扬。2007年，这档拥有百年历史的老会被列入了丰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与香会组织的复苏同步，中顶庙的修缮保护也被提上了日程。1982年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包括中顶庙在内各级文物的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1984年5月，中顶庙被列为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命运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机。当年，丰台区文化局下发通知，不允许再破坏中顶庙，庙内的电木粉厂也被要求搬出。由于当时无钱修缮，庙宇在一段时间内只能闲置，所以仍存放着一些集体物品，部分地方也继续用于出租以增加村里的收入。2001年，西铁营村从丰台区文化委员会争取到30万元，再贴以村里的资金，对中顶庙进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修缮。这次修复主要针对山门和大殿。2005年，第二次修缮开始对中顶庙进行彻底清理，不仅在庙里铺上青砖，还在西墙上装饰了《二十四孝图》的浮雕石刻，甚至搬迁了庙宇附近的七户人家和一些企业。大殿前西侧的“中顶普济宫百子胜会碑”和东侧的“甲子老会碑”，也被重新立了起来，两碑中间摆有村民集资办置的一口香炉。2006年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八），西铁营村委会请来了新的娘娘像，佛像由房山匠人李来法制造。2010年，第三次修缮建成东配殿和东耳房。2011年底，中顶庙的西配殿和西耳房修复完毕。2012年春季，中顶庙的围墙竣工并修复了东西侧门，在东侧院墙上添加了《朝元图》的浮雕，西侧院墙上则修复了之前的《二十四孝图》浮雕。庙南墙外侧东边有《道德经》浮雕，西边有《百子图》浮雕。至此，中顶庙重现生机。中顶村的“一统万年大鼓老会”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重整的机缘。

为了配合“中顶庙民俗文化节”的举行，西铁营村委会于2006年向大鼓会提供了约一万元的资金支持，将大鼓会重新组织起来。这件事情的负责人是从小就跟着大鼓会打花钹的刘子亮，他的父亲就是曾在长春堂做事的刘德元。大鼓老会的重整过程十分顺畅，主要原因是大鼓技艺没有失传。文革期间，外交学院的师生下放到中顶村劳动，在与村民联欢时，一位干部用打叉画圈的方式记录了70多套鼓谱，现在能演奏的有30多套。此次重整进一步规范了大鼓老会的表演形式：

第一组四人各挑副茱幌，茱幌上插四面黄底蓝边的三角旗，旗头用绳子对角连接起来，绳子上挂铃铛，随着扁担的颤动铃铛发出有节奏的音响，甚是悦耳；第二组八人，左手持一做工精细的宸子；第三组为花钹少年十六名，其中四名儿童持钹伴奏，儿童的身后有六名男青年，持新文帐为孩子们遮荫；第四组十名青壮年各跨一面大鼓，左手扶鼓，右手持鼓棒，按照套路节奏击鼓；四组构成浩浩荡荡的走街队伍，阵容整齐，声震远近，配合默契，错落有致。“一统万年大鼓老会”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被赐封会号，是丰台区现今仅存的一档“花钹挎鼓会”。2009年，大鼓会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中顶庙身份的变换与香会组织的重整再生，续写了民间香会文化的历史。作为一种饱含着村民集体记忆的文化传统，它们是村落认同的重要载体。尤其在北京城中村拆迁改造的背景下，村落终结的命运更使守护传统成为当务之急。为行将消逝的村落存留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忆，正是西铁营村自2006年以来连续举办“中顶庙民俗文化节”的重要原因。

### 三、“中顶庙民俗文化节”的仪式操演

2006年6月26日（农历年六月初一），在村委会的组织下，西铁营村举办了首届中顶庙民俗文化节。虽然庙会内容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名号的转变却体现了村领导规避政治风险的考量与智慧。为了筹备文化节，村委会专门成立了中顶庙管理委员会，由“一统万年大鼓老会”的会首田富旺负责。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在2006年2月到5月间为请娘娘像向村民募款。据田富旺介绍，当时大约有300人捐款，额度从100至10000元不等，其中租赁西铁营村土地的4S店捐了10000元，最终共募集了13万元。管委会为每个捐款的村民开具了收条并颁发了证书。

庙会半月之前，村委会负责联络京城各档香会的张天德向各香会发请帖。在确定参加文化节的香会名单后村里召开了筹备会，以确认各档香会进香的时间和出场顺序。与此同时，村里的男女老少开始打扫街道、布置中顶庙。村中的联防队也提前筹划当天的安保工作并拉好警戒线，为踩街队伍清理道路。水站、卫生服务队也都为文化节做好了部署。庙会举办的前三天，村委会还

为请来的娘娘像举行了仪轨齐备的开光仪式。

“中顶庙民俗文化节”保留了昔日庙会的习俗，流程安排承袭了京城香会走会的规矩礼法。事实上，中顶庙的祭祀礼仪已经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消散殆尽，香会的组织联络、顺序安排以及叫香的说辞、进香的礼法，都是由京城知名的老都管赵宝琪、黄荣贵等人在借鉴妙峰山庙会仪式的基础上重新制定的，因此文化节中的仪式过程更多的是传统的新编。

是日清晨，陈德清的德清鲜花圣会在中顶庙内外布置好装饰用的各种鲜花，以迎接香会和香客的到来。庙门前的电线杆之间也会拉上写有“中顶庙民俗文化节”黄色字样的红色横幅。中顶庙斜对面的西铁营村文化广场北侧搭起了大棚，德清鲜花圣会的娘娘驾供奉其中。仪式开始之前，“一统万年大鼓老会”在庙前排好会旗、会幡和大鼓，其他十余档香会在云林西路列队等待。

上午八时，当大鼓老会的鼓声响起，文化节准时开幕。大鼓老会首先进入中顶庙，为碧霞元君上香参驾。他手持燃着的香站在殿前的香炉旁，口中念道：“中顶村一统万年大鼓老会，向千金娘娘参驾进香，保佑一方平安，各位老都管上前有见了您呐！”这个仪式名为“叫香”。叫香之后，会首配合大鼓会的鼓点向娘娘磕三个头，这个礼节称作“三参”。而后便是香会“献艺”。“献艺”是指每档香会向娘娘表演自己会里的文武把式。大鼓会演奏一段献艺用的鼓点后离开中顶庙。紧接其后，其他会档次第进庙完成“叫香”、“三参”、“献艺”的仪式。

所有香会在进香献艺之后都会到庙对面的文化广场进行表演，懂得规矩礼法的香会还要与在广场上设驾（摆放娘娘像）的德清鲜花圣会“打知”。这也是在京城香会中流传甚广的一种礼节。“武会”与“文会”见面时，武会要在文会的棚前打招呼，持会旗相互鞠躬并献艺。在这个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文化广场，围观的人群可以更好地观赏香会的表演。参加文化节的群众大多来自本村和周边地区，其中包括住在西铁营村的外来打工者。每档香会在完成参驾和表演之后可以解散活动。这时，香会的成员自己进庙上香，以个人名义向娘娘祈福。临近午时，所有香会表演完毕，中顶庙会进入尾声。曲终人散，香会纷纷打道回府，西铁营村恢复平静。

2006至2011年的六届“中顶庙民俗文化节”

朝顶进香之香会包括：一统万年大鼓老会（会首田富旺）；馨春开路会（会首李瑞民）；德清鲜花圣会（会首陈德清）；众友同心中幡圣会（会首黄荣贵）；同心合缘五虎打路（会首赵宝琪）；群英同乐小车圣会（会首孙忠喜）；右外西庄万缘双石老会（会首翟继敏）。此外，还有专门请来活跃庙会气氛的河北徐水狮子会、学明艺术团以及白纸坊的腰鼓队和由西铁营村中老年妇女组成的太极拳队加入其中。2012年的第七届文化节又增加了石榴庄聚义同善天缘狮会（会首郑伟）；石榴庄聚义同善小车圣会（会首董树贵）；石榴庄双庙中幡圣会（会首梨树香）；石榴庄聚义同善旱船圣会（会首郑金利和张书清）；大红门村秧歌车圣会（会首孙宝刚）；永定门外海户屯村公义助善秧歌圣会（会首刘金荣）；左安门外曹家沟村聚义同善神耳老会（会首韩万才）；左安门外孙家场普善同乐五虎少林（会首刘立才）等8档香会。

与历届不同，第七届庙会的主办单位是中共丰台区南苑乡党委和乡政府，西铁营村委会和党总支为承办单位，并冠名为“2012年南苑乡民间花会展演暨第七届中顶庙民俗文化节”。由于前来的香会不能都进入庙内献艺，所以只能代之以集体进香仪式。7月19日上午七点十分，京城花会泰斗隋少甫的弟子、众友同心中幡圣会的会首黄荣贵，带领各会把儿头站在香炉东南侧，面向正殿，成一字排开，完成传统的进香仪式，期间由中顶村的大鼓老会进行伴奏。叫香、三参完毕后，依次由群英同乐小车圣会、众友同心中幡圣会和合心同缘五虎打路三档香会献艺，持续到上午9时。

与庙内三档特邀香会的表演同时，庙外西铁营文化广场南侧的主席台上也开始了文化节的启动仪式，由主持人介绍观看演出的市、区、乡各级政府领导、专家及参加展演的12支南苑乡民间花会队伍，之后由领导致辞并宣布文化节和香会表演开始。广场东、西两侧则摆放了长条的桌子和椅子让西铁营村的村民落座，他们身穿印有“中顶庙民俗文化节”标志的文化衫，这些文化衫是村里统一发放的。广场的入口处把守着村里的联防队员，没穿文化衫的观众只能站在外围观看。中午时分，表演结束，12支香会的把儿头面向主席台一字排开站好，听取北京民俗专家点评并在颁发奖金和授旗仪式中接受奖励。

#### 四、怀旧与乡愁：作为文化记忆的中顶庙会

历年文化节与香会进香献艺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庙门前、街道旁以及广场周边的条幅和氢气球上醒目的标语：“举办中顶庙民俗文化节，打造南苑乡特色文化品牌”；“推动亚林西开发项目，描绘西铁营美好蓝图”；“彻底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全面调整产业发展结构”；“借规划开发之势，强集体经济之基”；“聚地区村民之心，成跨越发展之业”；“努力拓展职工收入渠道，大力提升村民幸福指数”；“挖掘文物价值，发展文化产业，振奋村民精神”。这些宣传标语包含了都市村民对村落发展与保护传统的双重定位与期待。

中顶庙会是以碧霞元君信仰为基础，以中顶庙为空间载体，以香会表演为组织形式的节日庆典。作为地域性的民俗活动，它与村落的社会生态和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昔日庙会能以民俗文化节日之名重现，得益于西铁营村强大的经济实力，更与村庄面临拆迁的现实处境直接相关。1990年代前，西铁营村为老菜区，全村耕地面积约550亩，主要种植细菜、特菜。后由于城市化建设，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迁移，西铁营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实现了土地向非农利用方式的转变。北京勇光高特微电机有限公司、北京科彩印业有限公司、北京牛民山川机车修理有限公司等外来企业在本村的落户，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致使租赁房屋成为刚性需求。因此，西铁营通过出让土地和出租房屋获得了丰厚的财政收入。2010年，村里的外来人口约有13000人左右，而本村人口仅1552户，共2845人。全村的GDP为1.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支撑，中顶庙的修缮与保护无法落实，香会技艺的传承也难以持续。

2012年9月，西铁营村的城中村改造开始动工，中顶庙周围一片废墟瓦砾。在接下来的三年，村民会分散居住在各地，而后他们将迁回统一规划的住宅小区。对于这些都市村民而言，村落不仅是他们的世居之所，也是熔铸了他们生命体验的生活空间，而作为村落象征的中顶庙，更是连

接历史与当下，承载记忆与认同的文化符号。在修复中顶庙之初，很多村民特别是老年人就向村委会要求重新举办庙会。他们希望在村庄消失之前，让文化传统的再现成为村落融入城市的最后一幕。这就是怀旧，“这种怀旧不是要在现实层面上返回过去，也不是在精神世界里完全依赖或寄望于传统的安抚，而是通过记忆使时间的碎片与现实碰撞，从而在一个个被记忆和现实双重塑造的碎片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实感。”<sup>①</sup>

回首中顶庙的历史和七届民俗文化节的仪式过程我们发现，庙的修缮与重建传递的是村民对祖居地留恋不舍的深情。村落消失之后，带有社会标志和象征情感的中顶庙就会成为村民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会对强化和重塑村民的历史叙述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因为人们的记忆总是利用空间参照点来表达的。正如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关于群体对空间及记忆的依附之论述，“如果要通过集体记忆使群体在任何时间都保持不变、保持同一性，那么其中一个方法是保持物质环境的持久性。……只要具有重要特征和意象的承载体保持稳定，其呈现出的秩序与平静便能让我们在这令人欣慰的延续性中认识自己。”<sup>②</sup>那么，都市村民如何利用中顶庙来维持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凝聚力？又会以何种方式将其转化成为传承群体记忆的文化空间？组织并开展仪式活动，是使记忆复活、场所持久不可或缺的路径，这正是西铁营村修复中顶庙并复办中顶庙会的深层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庙会庆典的方式对传统的刻意存留，“从历史的层面来说，是借助‘向后看’而‘向前挺进’；从社会现实的层面来说，是在碎片化生存中对记忆和现实的调解，对自我与世界、现实与传统、瞬间与历史之间复杂关系的认同。”<sup>③</sup>正是这种仪式庆典的习惯性操演，不断地激活着村民心灵深处对过去生活的情感与记忆，从而弥合了因村落消失所导致的认同上的裂痕。此时，尚未建成的地铁14号线有一站名为西铁营站，这令村民尤感欣慰。因为这冠以村名的车站与中顶庙一样，承载的是村庄的历史，述说的是绵绵不断的乡愁。

[责任编辑] 刘晓春

① 赵静蓉 《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1页。

② [法]埃米里奥·马丁内斯·古铁雷斯：《无场所记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2年第3期。

③ 赵静蓉 《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第191页。

## **The Urb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in the Context of C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Guangzhou Municipal Construction's Influence on Urban Dram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Junhua Song , Chun Huang* 58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Guangzhou municipal construction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urban Chinese drama. The following aspects could be found as follows. Firstly ,urban drama space transformed from purely commercial theater to cultural spaces which integrated commercial , professional and communal qualities. Secondly , the themes of history , love , fairy and etc. faded out , instead , the realistic and the politic themes protruded. Thirdly , urban drama changed the performanc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and formed a new pattern which centered on commercial performance but also included many other forms. Fourth , urban drama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performing forms , the inheritance ways and the cultural ecology , thus formed a new drama business situation. The Guangzhou municipal constru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tered the older drama business situation locally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 and meanwhile created a precedent of modern government's intervening in drama performing activities.

## **Folkloristic Fieldwork in Urbanization Process**

*Tieliang Liu* 99

Urbanization requires to get rid of the folkloristic habit of insisting on seeking and protecting traditional customs , and instead to propose new research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realistic life. Urbanization results are not only city expansion and village decrease , but also a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 rural relationship , which profoundly transform daily patterns of work , leisure and communication , precipitate a universal cultural practice which could be called Village Memory and City Memory , simultaneously many newly born social groups and marginal living cultures have appeared. All above mentioned indicate that folkloristic study will have bright prospects and would play a special role in participating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practice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ng , study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se cultural changes , folkloristic has been rethinking and reconstructing its own concept , issue and method. It will further take fieldwork as a process of cultural dialogue and , ethnography as cultural medium of communicating life perception; strengthen the angle of body culture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great influence exerted by high - tech development on human behavior and communication modes.

##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Zhongding Temple Fair and Urban Villagers' Cultural Nostalgia**

*Qingzhong Sun , Yao Guan* 108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Zhongding Temple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Bixiyuanjun Temples in the capital. As a special public memory space , it carri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hanges of Beijing folk society , and also record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society to urban blocks. Being held in the name of " Zhongding Temple Folk Culture Festival" , Zhongding Temple Fair has been carried for seven sessions since 2006. Its ritual process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rules and rites , and has created a cultural atmosphere blended history and reality , mind and body. This unceasing activated collective memory may be regarded as remembering the old lives of village history. But in fact , it is one kind of emotional power of social reproduction , and the survival wisdom by urban villagers , for dealing with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by cultural memory.